

星光映照

甘肃

● 徐冰 张文辉 编著

星光映照甘肃

——中共甘肃党史史话

●徐 冰 张文辉 编著

甘肃省青运史工作委员会

甘 肃 省 林 业 厅

目 录

- 邓春兰呼吁大学开放女禁..... (1)
- 新陇杂志..... (5)
- 党在甘肃的最早活动..... (8)
- 宣侠父和甘南藏民反压迫的斗争..... (13)
- 甘肃大革命的风暴..... (17)
- 太白镇夺枪..... (20)
- 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24)
- 1932年的甘肃兵暴..... (28)
- 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在陕甘边..... (33)
-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37)
- 南梁苏维埃政府..... (41)
- 俄界会议..... (44)
-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 (48)
- 红军哈达铺休整..... (51)
- 中央红军在通渭..... (54)
- 红军西征甘肃宁夏..... (57)
- 三军大会师..... (61)
- 山城堡战役..... (65)
- 西路军初战靖远、景泰、古浪城..... (68)
- 西路军在永昌、山丹、临泽的苦战..... (71)
- 红五军血战高台..... (76)
- 西路军兵撤祁连山到石窝会议..... (79)

西路军左支队到达新疆·····	(82)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	(84)
抗战中的中共甘肃工委·····	(88)
陇东摩擦事件·····	(93)
甘南农民大起义·····	(96)
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 ·····	(100)
抗大七分校在华池开荒建校 ·····	(104)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甘肃工委 ·····	(107)
陇东保卫战 ·····	(111)
兰州大决战 ·····	(116)
大西北和甘肃的解放 ·····	(121)
附录 ·····	(124)
后记 ·····	(126)

邓春兰呼吁大学开放女禁

在1919年的甘肃和北京之间，有两条路相连。一条是陆地上的路，经陕西、河南进入北京；另一条是水陆相接的路，即由黄河漂流，行驶到绥远，然后再搭乘火车进京。东路崎岖，时常有土匪袭扰。北路危险，旅客要为滚滚黄河水而提心吊胆。

1919年7月26日清晨，有一只木筏从北路启程，在兰州城黄河中段，随着水手的吆喊和动作，木筏脱开缆绳，顺下流漂出去。这时候，坐在木筏上面的六个年青女学生装扮的人，紧靠在一起，看着咆哮的黄河水托浮着这只木舟。

木筏进入桑园峡，水面汹涌起伏，迎面而来的河两岸都是相峙而立的巉岩巨石，筏与水撞击起来的浪花纷纷扬扬地拂洒弥漫，水雾浓重，遮蒙了天色亮光，浸湿了衣衫，轰雷般地吼叫，令人心悸目眩。看到“月亮石”、“大小对望”这些地方，水手们便发出“嘻嘻”地喊声，他们的力气似乎都用尽在这时候了。

在水手旁边坐着的一个女学生，短发白裙，黑衬衣衬托出她那娇嫩而倔强的脸庞。她此时的心里，激动着不平静地感觉，初次对黄河的体验和她此行的心事相交织在一起了。

她叫邓春兰，一个出身在青海循化(当时属甘肃管辖)，生长在甘肃兰州富贵之家的年轻女学生。这一次是和其他5个姐妹赴京，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就读去的。

对邓春兰来说，她已经该满意了。她现在已是高等学府的学生了，可是对此她并不觉得轻松，因为她时刻惦记着另一件事，她要在全国呼吁：使大学解除女禁，让男女同校，彻底打破男女在受教育权利上的不平等现象。

当时，随着科学、民主思潮的兴起，中国大地上开始产生了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男女平等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但是在全国的学校里却还仍然沿袭着千百年的封建旧习。男女不能同校，女子要与男子一道入校教育是不可能的。1919年时政已有变化，女子可以上学，但仅有女子师范一处才专收女生。邓春兰很久以来一直在想：为什么男子可以进入各式各样的学校？为什么我在甘肃耳闻目睹那么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就无法消除呢？我应该为打破这种不平等做一些什么事呢？

这一年，她终于产生了一个想法：她要呼吁社会，让各个学校都招收女生。

1919年5月19日，邓春兰给当时的国家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写了一封信，要求在国立大学设立女生席。但是，教育界的泰斗蔡先生却没能给她回答。蔡元培当时正处在支持同情保护“五四”爱国学生的紧张关头，因不满军阀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愤怒辞职出走了。

邓春兰毫不气馁，她在得不到北大音讯的情况下，又给报界写了一稿——《告全国女子中小学毕业生同志书》，她在《告同志书》中说：欧洲大战结束以后，西方诸国女国会议员大有人在，不久还将见到女总统出现，而我国教育尚如此不平等，真令人着急不安。我将组织大学解除女禁请愿团去北京，用种种方法，不惜牺牲所有，百折不回，务达此目的而

后已。她将这份《告同志书》和给蔡元培的信一齐交给丈夫，请他设法转递北京、上海报界。然后她就登筏上路了。

日复一日，木筏仍在惊涛骇浪中奔波，愈行愈有不同景象。8月30日，木筏驶入宁夏中卫。邓春兰几个人又改乘木船驶向包头，从这儿开始，黄河航道开始开阔平缓，时而还可观望岸边树绿花红的村落。这时候船工便停泊歇息，春兰和其他姐妹们便登岸去游览、采集花草，然后欢呼着跑回来。

也有的时候，木船行驶到夜里仍然不见村落，这时，乘客们只能在船上歇息。睡梦中，耳边能听到野狼的嚎叫，天宇间只有稀若的星光作伴，邓春兰这时候便在船仓里边的小灯下，用笔认真地记下了自己一路的感受。

就在这漫漫四千里路程中的一个多月里，邓春兰的信和书在遥远的上海和北京引起了轰动。上海、北京许多大报纷纷发表了《告同志书》和信的全文。8月3日，北京《晨报》以《邓春兰女士来书请大学解除女禁》为题刊登，上海《民国日报》8月8日以《邓春兰女士男女同校书》为题刊登全文。报界的呐喊，为新文化运动助威，响应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提出的“妇女解放”的口号，就在甘肃邓春兰的信发表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都分别给报刊撰写文章，支持男女同校。一些报纸专辟“妇女号”，专门讨论男女在教育、职业、家庭婚姻等方面的问题。一时间，邓春兰的名字为许许多多的人们所知晓。人们说起妇女解放问题就想起了邓春兰。

邓春兰的信和书在新文化运动中引起了积极的效果和反应，李大钊在文章中说，他赞成用妇女的全部力量去打破男

子的专制社会制度。大学者胡适在文章中还设想了开女禁的步骤和程序。9月1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复职后，立即主张开放大学女禁。

邓春兰8月27日从绥远丰镇乘火车进入北京，她同甘肃籍爱国学生会合了。这一天正好是反动当局被迫释放五四爱国学生的日子，她见着了甘肃籍亲历五四运动的爱国青年学生张心一、张明道等人，并和他们在一起开始筹办刊物，她继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妇女解放的重大意义。

1920年2月，北京大学第一次正式招收了9名女学生入学旁听，邓春兰就是其中的一个。大学女禁的解除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纪元，邓春兰为此立下了首功。

继北大之后，全国各学校纷纷效仿，陆续解除女禁，男女同校，男女受教育平等的风气从此蔚然成风，千年的陋习终于被打破了。

新 陇 杂 志

在五四运动开始后的第二年，旅京学习的甘肃籍学生手里，开始传阅着一本书。这本书有16开大小，足有100页之多，封皮和书蕊纸发黄，封皮上半页印有两个醒目的大字——“新陇”。书皮的下半部分印有几行内容提要。一群学生眼盯着这几排字，几乎不约而同地念出声来：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洪水与猛兽》……

“好哇！”有个学生念着念着竟然鼓起掌来，“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杂志了”。他高兴地说。

这些穿着长袍的男青年和留着短发的女青年就是这本书的编写者，他们都是从千里以外的甘肃省来京求学的，在刚刚过去的“五四”风暴中，他们同从全国各地汇集于京城的青年们一起，参加了几次声震全国的大事件。他们上街游行，在广场上静坐示威，有的甘肃籍学生甚至还同封建军阀政府的头目面对面地争辩过。

现在，当斗争刚刚过去了第一个高潮，一本书就从他们的手中诞生了。不过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而是一份杂志，是一份由甘肃籍旅京青年学生创办的，针对甘肃问题，面向甘肃读者的刊物。

他们为什么要编写这么一份杂志呢？

原来，在这些日子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经常谈起自己

的家乡。是啊，和京城、和发达的一些地方相比，我们的甘肃老家的确是太落后了。这些日子，许多种由外省旅京学生办的刊物出现了，这件事也启发了他们，一种要改变甘肃落后和黑暗现实的决心促使他们要编写这么一份杂志。

开始，他们到出版社和印刷厂去核算办刊经费，这么多的钱轻易是出不起的，他们解囊凑钱，生活费被压缩了，零花钱被抠出来了，钱算是凑齐了。

接着，第一批稿子也筹集好了。他们认为这些反映当时新文化思潮的文章，只有先被甘肃人民了解，然后就会被他们择优吸取。因此，新陇杂志选编文章的内容涉及较广：有陈独秀的，也有胡适的，有谈外界文明先进的，也有讲甘肃贫困落后的，虽然这些观点不同的文章被后来证明差异很大，但编者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寻求解决甘肃贫困落后的良策。

就在北大校舍里欢呼《新陇》杂志出刊之后不久，在甘肃省会兰州等地的学校里也出现了这本杂志，人们争相传阅，书中的观点不径而走，新陇谈到了甘肃的封建现实，谈到了甘肃的经济和妇女解放问题，引起了读者们的连声称道：

一个操着兰州口音的人说：“可不是，世界上早就文明了，可我们的省长和督军却还在拜佛求雨呢！”

“他们一出门就是八抬大桥，威风得不得了。”人们愤愤不平地说。

“甘肃的工厂只能织点呢子布，铸点铜钱，和人家外国怎么通商呢？这世道不变真是不行呀！”

在甘肃的市井街巷和校舍里，先是有了《新陇》，后来逐渐有了其它的书籍和杂志，有了《共产党》、《新青

年》，也有了兰州人自己办的书刊社。在离城隍庙不远的街道旁，有个人开了一个正本书社，专门卖这类进步书籍。这个书店的门面虽小，却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来买书的人多数是教育界、知识界人士和青年学生。

也大约是从有了《新陇》开始，时光越往后走，兰州城市的街头也变得不安宁了，市民们不止一次看到了兰州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在兰州仅有的几条大街上，隔段日子就会有一群群青年人排着整齐的队伍，举着横幅，高喊着：“纪念国耻日”、“还我山东、青岛”的口号，最大的一次示威就有两万多人参加了进去。省城之外，农民也闹起来了。陇南文县的农民闹“抗青苗款”，有的市县闹“天足会”。每逢一闹，日本产的商品便被扔在大街上冒起了黑烟，政府便出动军警镇压，青年人和他们对立了起来。这次被驱散了，下次又起来了。直到了1925年，这种局面才发生了变化。

在1925年前后，一些在外求学的青年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并把这些思想播到了甘肃这块贫脊的土地上。首先是榆中青年张一悟从武汉高师毕业，后来到古城凉州任教。武威青年有幸从张一悟的演讲中听到了崭新的名词——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

1925年夏天，位于秦川之端的宁县太昌镇，成立了一个名叫青年社的组织，创办人是本地去西安读书的青年王孝锡。是他利用暑假回家的机会组织的。青年社活动多是在晚上集会听讲。这时候正赶麦黄时节，在距西安约二百公里之遥的这个陇东小镇的那些个夜晚，王孝锡给听讲者们大声说：“我们从现在起，要立志改造人生，改造社会。”

在偏远落后的甘肃，一场革命的风暴就要来临了。

党在甘肃的最早活动

1925年的一天，从华北开出来一支浩浩荡荡地军队，这支军队沿着内蒙、宁夏方向西行，一路军容整齐、歌声嘹亮。军旗在呼啦啦地飘扬着，从那装备齐全的军容上看，这是一支整体进军西北的军队。

这就是冯玉祥将军领导下的国民军第二师向甘肃的进军。原来，甘肃是没有国民联军的，只有旧军队。名义上归北京政府管辖，可他们在远离中央政府的甘肃争斗权利。甚至到后来出现了甘肃一个叫李长清的小军阀，依仗军队把甘肃政府当权者赶下台，自封为甘肃王。发生这样的事件以后，北京政府就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们连忙封威名显赫的冯玉祥将军为甘肃督办，想用冯将军的力量吓住甘肃当地的小军阀。于是，冯将军的国民联军第二师就这样开始挥师入甘了。

部队出发半月，一路穿过大青山一侧的平原，这是内蒙地界，人烟稀少，甚至连树木也不多见。经内蒙到宁夏地带，越往西就显得越有生气，人烟愈多，城镇或村落可以逐日所见，有些地方甚至显得富庶，最后他们来到了平罗城。

和北方许多古城的外观相似，平罗城也矗立着一座威远楼。城门廓然，城外百姓集结迎军，这时候，先头部队停了下来，准备号令一下便进城去。

忽然，从城里驶出了一辆马拉的轿车，直向二师师长乘

坐的车子而去。这辆轿车装饰华丽，里边坐的那个人不用问就是平罗县知事之类的人物。此时急匆匆地去约见师长刘郁芬，紧跟着轿车奔跑的是十几个清朝打扮的兵勇，他们前胸后背写着“亲兵”两个大字。

当轿车驶出城门后，涌在城外的群众便哗哗地的像潮水一样朝两边退去，迅速地让出了一条路。人们小声地咒骂着，同时又不敢让在路的另一端歇息的国民军们听到。

这时候，这一部分国民军大约也看到了群众的表情和情绪，他们中有两个人这时候便主动地走到老百姓跟前来，用江苏、浙江一带的南方口音同群众说起话来，好在他们的江浙口音群众还勉强听得懂：

“老乡们，刚才过去的车上坐的是什么人？”

“那还用问，是县老爷知事大人”。人们回答。

“不对，你们说错了，那车里坐着一个死人”。

“哇——”人们惊呆了，远处的人赶凑过来，近处的人们恨不得把耳朵竖起来听：

“老乡们，你们不要害怕，我说的是清朝的制度和人物如今还能在这里见到，的确是一件怪事。封建的满清朝代已经死了，进入棺材了，知县还在搞那一套，这不是死人又是什么呢？”

人们听着，慢慢地脸上露出了笑容。

离开平罗县城之后，国民军继续西行，那两个向群众作了宣传演讲的人，这时候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们一路上仍不停地宣传演讲，组织士兵在人群密居地张贴标语。那个在平罗城演讲的青年军官叫钱靖泉，另一个叫宣侠父。

钱靖泉和宣侠父是共产党员，隶属国民联军政治部副主

任刘伯坚同志领导，刘伯坚是冯玉祥将军请来作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刘伯坚派钱、宣两人随军入甘，一边做军队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又肩负着秘密发展党组织的任务。

国民联军第二师自从有了三民主义内容的政治活动以后，军队整个地变了样子，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和政治处负责人的宣侠父、钱靖泉，给二师带来了新的气象。兵士们唱着崭新的歌子，革命的口号使队伍上下精神振奋，这样的行军生活过去了43天，他们终于到达了黄河的北岸。南边，兰州在望了。

国民军终于走进了兰州城这座巨大的城廓。

随着国民军进入兰州后的一系列活动，兰州的面貌变化了。群众从他们佩带的臂章上看到了“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字样，从他们的胸章上看到了“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誓言。但群众最受欢迎的是随军入甘的共产党员们的活动。

宣侠父、钱靖泉和先在甘肃的共产党员张一悟在一起成立了中共甘肃特支，这是1925年冬天发生的事。在特支成立以前，张一悟就在甘肃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特支成立后他担任了书记。从此，党在甘肃便开展了正式的组织活动。

他们几次在辕门广场的亭子里发表演说，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宣侠父、钱靖泉经常对着街市大众公开宣讲，他们20多岁，一个个英气勃勃，一边说话，一边挥舞着手中的小旗子。这些小旗子上写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军阀！”听演讲的人一次比一次多，有的听众慢慢地听着听着，也模仿着他们的样子拿起了小旗子来了。

兰州市道升巷是居于城市中心的一条小巷，离辕门广场

不远，砖石铺成小道，两边尽是颇具中国古风的四合院住宅。有一座院内门上雕花的房子就是特支最先活动的秘密据点。这家主人是位温柔开朗的女性，叫秦仪贞。她首先成了特支发展的共产党员之一。往后，这座院子每天便有许多陌生的青年人进进出出。

省立一中位于城中，从远处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座规教森严的学堂。在一中的大门外边有块空旷的地方，学生们常在那里玩耍。每天晚上，经过这座大门到校园里边去的青年人三五成群，他们中不少是听特支同志讲课的。一中本身是知识青年集中的地方，在接受了革命的宣传之后，一些人成了党员，也有的人入团了。这里边有年青的教师，也有正在上学的学生。他们印小报、排演话剧、举行演讲，搞了许多革命的活动。

剪着短发、穿着朴素衣衫的兰州女学生们也被组织起来了。在声名远扬的五泉山脚下，又一所幽静的庭院变成了女青年们活动集结的场所。一份叫作《妇女之声》的刊物在姑娘手中传来传去，许多集会活动中都能见得到她们那崭新的装扮和面容。

特支通过宣传培养了骨干，发展了党员队伍，在唤起甘肃民众上作了许多事。

在宣侠父他们到来之前，兰州就有着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在军阀的统治下处于地下状态。共产党员们帮助他们从秘密走向公开。但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却对共产党员们的活动惊恐不安，他们看见学生被鼓动组织起来了，青年们起来了，就到处煽风点火说：“共产党要让男女青年们上街搞裸体游行了”。他们还造谣生事，竭力想把青年和共产党的组

织分开。

为了打击国民党极右势力，特支组织了一次针锋相对的“联欢会”。这是一个临近元旦的日子，在兰州的皖江会馆，由一批共产党员和青年社积极分子搞起来的。

这次，他们利用元旦联欢的名义，召集了全体国民党员到皖江会馆，大家愤怒地揭露了右派分子的阴谋。在皖江会馆一座装饰漂亮的礼堂里，汽灯把会场照得明晃晃的，几个鼠头鼠脑的人，被一群愤怒的青年人打得鼻青脸肿。他们被轰出了会场，剩下的人继续开会。接着，新的省市党部选举成立了，共产党员们控制了国民党党部。

兰州的斗争虽然胜利了，但过了不久，却遭到了右派势力的诬陷和打击。钱靖泉被捕了、宣侠父也被迫离兰东去。几个在皖江会馆事件中暴露了的共产党员转移去了西安，党的工作依然在艰难中进行。

宣侠父和甘南藏民反压迫的斗争

宣侠父刚随军来到兰州，就在甘肃省督办府上任，担任了国民军和省督办府的政治工作要职，他自从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就开始认真观察起自己所面对的甘肃社会来了。

自从国民军来了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兰州的社会风气变化了，军政大员们不吸大烟了，人们把过去叫的大帅衙门改称叫作督办公署，机关官员们脱掉了长袍马褂。

但是这仅是表面地变化，在整个甘肃广阔复杂的大地上，还有不知多少封建势力军伐当道的事啊！

经过几天的考虑，宣侠父决定要进一步深入到兰州以外神秘的生活里边去，尽自己的力量做一些打倒封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事。

正巧，就在这时候他碰上了一件大事。

有一天，宣侠父正在督办公署上班。房子里进来了几个藏族青年人，为首的叫黄正清，是甘南藏区藏族领袖嘉木样的哥哥。他通过跟随的汉语翻译对宣侠父说：他们是甘南藏民代表团，这次专程来到兰州是向国民军告状的。他讲了好大一会，宣侠父终于弄明白了发生在甘南民族地区的事。

原来，这次黄正清带了10个人来兰州上诉于国民军，是控告青海封建军阀马麒对甘南藏民的野蛮欺压。

两年前，甘肃 四川边境一带加上青海省东南部共有88